

本草
粹溪

世民
造園

目录

引言	1
01 / 认识	5
02 / 空间	17
03 / 系统	29
04 / 反思	43
05 / 补注	57
06 / 跋	63

引言

金华磐安县榉溪村杏坛书院的卢震老师在跟我们的一次闲聊中，提到村子的地理位置是在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南麓，这个保护区是国内唯一以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为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村子所属的磐安县多用“磐五味”来合称当地出产的五种中药材——白术、元胡、芍药、贝母、玄参。卢震老师曾在中医药的学术体系中研习针灸推拿之术，在榉溪村待久了，他发现当地人在野采、自种或使用中草药的过程里，有着不少值得记录和理解的地方智慧。由此，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进行一次和榉溪地方草药相关的植物内容研究与书写。

我们先就“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磐五味”两个名词，将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加以整理，以作为这次进入榉溪村庄学习的背景¹：

浙江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磐安县境内，以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和道地药材种质资源及其原生地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是我国东部药用植物野生种或近缘种的最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及天然药材基因库。保护区现知有野生药用植物 1000 余种，占浙江省药用植物种数的 60% 有余，其中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近 250 种。

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中亚热带北部、亚热带南缘，是南北植物汇流之处。2001 年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2002 年获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国内唯一以野生药用生物种质资源为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所在的磐安县，也是中国重要的大宗道地药材主产区。栽培药材以白术、元胡、玄参、白芍、贝母、玉竹等传统道地药材为主，栽培历史悠久，面积大、产量高，属地方名特产。清朝和民国时，白术、玄参、白芍、元胡等四大传统道地药材，就名扬四海，有“药花开满若霞绮，玄参白术与白芍，更有元胡，万国皆来市”之说。建国后，贝母和玉竹逐渐成为磐安产量最大的中药材。2010 年，磐安县政府注册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磐五味”，用作磐安中药材的核心品牌，以保护、利用本地出产的白术、元胡、白芍、贝母、玄参等五味道地药材。

1. 信息来源包括：浙江省磐安县环境保护局在 2001 年编撰的《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考察报告》；陈远志、张方钢和陈水华在 2010 年共同主编的《浙江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考察与研究》；浙江日报记者金波在 2022 年报导的“从‘磐五味’到虫草培育，看中药产业进化路”一文；百度百科“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词条。





01/ 认识

提及有关地方草药的植物内容研究，我脑子里首当其冲的是断断续续收集了一阵子、与“植物学”和“本草”这两个关键词相关的信息线头——毕竟，“植物学”这三个汉字跟 Botany 背后的现代科学知识建立关联也只是 1858 年开始的事情¹；那么，在这个节点往前的过往中，被现代科学视为博物学或植物学的“本草”又是如何观察、记录、描绘和理解植物的？——说回这次的“命题作文”，我们就顺着“本草”源流的梳理，开始编排与“本草”和“草药”有关的案头片段。

“本草”一词首见于《汉书》：“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初唐儒家学者颜师古注：“本草待诏，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盖官名也。”“本草”和“方药”，都是该专职古代文官的工作对象，大抵等同于古代药理学²。不过，“本草”编织的知识体系并非只有药理学。若以西方现代科学的视角来看，“本草”也涵盖了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内容；有的药用植物还曾多以仙药形象出现，使得炼丹术和化学也能被纳入本草学的讨论。对一位“本草待诏”来说，“方药”很重要，人命所系，甚至是作为前提的保底。但“方药”并不是“本草”的全部，不然颜师也

是草还是药

没必要一前一后重复注释。“药”是“本草”关切的重点，但同时“本草”也关注“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核心的名物之学”，还有文人生活中的雅玩和诗兴³。

西方第一位全面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博士就曾将“本草学”写作“药用博物学”（Pharmaceutical Natural History），以现代西方熟悉的“博物学”对应“本草”囊括的广泛话题，同时也不忘冠上“本草”体系中关切的“药用”目标。较李约瑟往前近两个世纪的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Pehr Osbeck），在1750年启程前往中国为其老师卡尔·林奈编写《植物种志》收集信息时也有说：“我非常渴望了解中国草药的知识，以及各种草药所对应的疾病信息……我希望征询那些能在这方面给予我指导的人，并获得一定答案”⁴。

奥斯贝克短短的一行话，反复提到了中国的“草药 / 药草”——他不光对古代中国的“药”感兴趣，更对彼岸有着“药用”功效的“草”渴望之至——这多少跟欧洲医学在更早时候的15、16世纪对“药用植物”的密切关注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那时大部分的药都来

自植物，药剂师的本分涉及“采撷本草、探访草药的不同疗效、分析药物的化学成分……[其]地位相当于专业医生”⁴。那些能够救人性命、治人疾患的“药”虽在古代中国的“本草”知识体系里包罗了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内容，10世纪刊印的《蜀本草》中早已点明：“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⁵。能入药的“本草”虽不只有植物，“草类”确是药用本草的大头，“用本草来代替药物，属于用部分代整体的表达手法”⁶，也夯实了能成为“药”的“草”在古代中国本草语境里的根基——也正是奥斯贝克来回念叨的“草药 / 药草”。

当我们揣着这条绕口令——“本草”不等于“药”，“药”是“本草”关切的重点；“本草”中的“药”不全是“草”，但其间最多的是“草”——再看回这次的“命题作文”，心中也就有了取舍。相较于“本草”，“草药”作为本草知识体系中关切的重中之重，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件更为趁手的工具。中国医疗、卫生和疾病史学者方小平也在《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提到“中国农村常用的药物主要是从野外采集的草药”⁷。

跟着“草药”的脚步，窥探人们在浙江金华磐安县盘峰乡榉溪村落中的生活世界，我们实则是希望捕捉“草药”在地方村民和大盘山南麓自然环境间，埋藏的草蛇灰线。尤其是当我们从案头研究的信息海洋，转身步入榉溪村的现实田野，我们首要关心的是：对生活在榉溪村的人们来说，“草药”是什么？



这是中医名方“丁香柿蒂散”中的柿蒂。图源 / 樺溪·杏坛书院

1.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潘吉星曾考证“虽然古代研究植物的著作很多，却没有为这门学问取个适当名称，因为那时植物学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系统科学。当李善兰[在1858年出版的《植物学》一书中]将‘botany’译为‘植物学’的同时，中国才有了这门科学的系统知识。”详见：潘吉星。“谈‘植物学’一词在中国和日本的由来。”大自然探索. 03(1984): 167-172.
2. 本草学和药理学研究者王家葵曾在发布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的文章“王家葵谈本草、本草学与本草文献”提到：可以直截了当地讲，“本草”从概念上大约与“药理学”相当，故将“本草”定义为古代的药理学，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在多数时候，本草用来作为本草药（药理学著作）的专名，汉代以来的古代药学著作，绝大多数都以本草为书名，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本草纲目》。详见：“王家葵谈本草、本草学与本草文献”。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202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412482.
3. 李晓愚.“从皇家药典到‘珍奇之橱’：《金石昆虫草木状》与明代古籍艺术化改造。”文艺研究. 02(2022): 117-133+185. doi:CNKI:SUN:WYYJ.0.2022-02-016.
4. 详见：“全球医疗疾病卫生 | 高晞：地理大发现后的‘中医西传’”。“全球研究 Global Studies Forum”公众号. 2024.08.26. <https://mp.weixin.qq.com/s/H-xjDg4mcOazRC1LfHYOqQ>.
5. 《蜀本草》是由五代后蜀翰林学士韩保升等人编撰的一部本草著作。《蜀本草》不仅是第一部四川官修本草，也是北宋第一部国家药典《开宝本草》的蓝本之一。
6. 详见：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国家中医药数字博物馆。“本草”. 2022. https://www.nmtcm.cn/allusion_detail/584.html.
7. 方小平 著. 董国强，干霖，王宜扬 译. 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 2024. p90.







正在处理药材的孔加银阿叔。图源 / 樺溪·杏坛书院

听闻村子里擅长中医骨伤的孔加银阿叔只要天气晴好，一家三人都要到四周的山中采挖野生药材⁸。我们希望能有机会能一同前往，在阿叔家了解后几天采药计划时，也跟阿叔的女婿曹大哥聊到了门口木箱里的两株常春藤。“这个常春藤是园艺的，跟我们明天要采的不一样，你看它的角不是三角形的，要圆一点，野生的颜色也比这个深多了。这个野生的是我挖来的，放那里七、八年才长这么大，园艺那种就很好长，爬得满墙都是。野生的要能爬到树上去，就长得很快，吸收树的养分。在地上，它就长不了，长不快。”

原有的认知中，我总以为药就是药，园艺草类是因为只作美化观赏之用才得其名称。但借由曹大哥介绍的常春藤、以及卢震带我们转村时随手指到的种种，我开始意识到，哪怕是同一种植物而言，也常会兼有药用和园艺观赏这两种特性。城市景观中常用的沿阶草麦冬，要“种阳面就是园林绿化，种阴面就是草药”；常治咽喉肿痛的草药射干，现在多为园林品种。

初访樺溪的几个日子里，我大多是在缝补式地调整潜意识的“二元”认

识。等到有天午后，我们在村里的桂香商店买完冰棍，羊阿姨给我们介绍她店对过一小块靠墙地里的几十种草药，脱口而出“不知道的人看到的都是草，知道的看到的都是药”。我想，我们是抓到了“草药”在村子生活中的一则注脚。

村子里这样的小草药地还有很多，有像羊阿姨店门口这块自然野长的，也有曹大哥这种到山上采药带回几棵种在屋边地里的。不过，曹大哥还说，虽然山上带回来的，在园子里都能种活，“如果你拿药，看用药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像这个四叶对⁹，它都能种，然后你肯定那个野生的，它原来就长在那里的，那个状态效果好，很大，有些一斤多。”“草药”除了“又草又药、全凭与之对话者的认知经验”外，我们还意识到，大多数时候，“草药”并非是“萝卜就能当萝卜用”的简单对应，其还会根据生长环境的不同，在药效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体现。曹大哥给我们举了一个桂枝¹⁰的例子，这种药材，光山上长的，“就有五、六种味道，那种有点好像薄荷一样气味的最好”，上山野采的时候，还得靠逐一尝过树根的味道，才好分辨。

我们在学者方小平的中国乡村现代医学研究中也注意到：“同一植物的根须、茎杆、叶子和果实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段的治疗功效差别很大。如果在错误的季节采药，它们将毫无用处。”他引用了广东省植物研究所采药知识编写组在1977年发布的《采药知识》中收录的一句当地谚语“三月茵陈四月蒿，传给后人切记牢。三月茵陈治黄痼，四月青蒿当柴烧”¹¹。

由此，我们也更能理解在历代本草有关药用植物栽培记述的学术研究中，为何会将“栽培环境对药用植物品质的影响”列为注意的首条。野采尚且如此，不光要认草药，还要能辨药效，“采萝卜未必能当萝卜用”。在较山中自然环境更为人工的栽培环境中想要“种萝卜就能当萝卜用”势必是困难重重。“如《本草纲目》引汪机的《本草汇编》中论水仙云：‘九月初栽于肥壤，则花茂盛，瘦地则无花。’又李时珍论薄荷云：‘苏州所莳者，茎小而气芳，江西者稍粗，川蜀者更粗，入药以苏产为胜。’苏颂论地黄云：‘古称种地黄宜黄土，今不然，大宜肥壤虚地，则根大而多汁。’”¹²

榉溪村的田野经历让我们意识到生活在这儿的人们，不光会提草药的“又草又药”，也在意草药“土”的那一面。这里的“土”，不是“洋气”反义词的那个“土气”，而是草药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脚底土地里承载的那份“风土”¹³。“土”的这一面包含了草药生长环境中的零零总总，像是时令节候、地势土质、朝向疏密等要素，事无巨细，点点滴滴都跟草药能够“又草又药”的状态休戚相关。再看田野笔记里多次记下的“土草药”这个词，想来村子里的人们在用“土”这个字形形容草药时或许并不单指向“地方”或“民间”，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当地多以自然采摘获取的草药和土地间的紧密链接。

“草药”虽已从“土”中采出，其与周遭环境的点滴互动，却也都凝练在了“土草药”的这一称呼中。当然，周遭环境不单指向大盘山南麓、草药生长的自然生境，也包含草药在炮制、贮藏和药用过程中卷入的社会环境。197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草药运动曾以“一根银针、一把草

8. 杏坛书院在“一个人的村庄”项目中曾采访过加银阿叔和曹大哥，采编文字详见：“榉溪图文展 · 杂志书 / 民间医学和武术：中医骨伤”。“杏坛书院磐安榉溪”公众号。2022.10.17. <https://mp.weixin.qq.com/s/NZzadzmQlIXEw2pktaGsGA>.

9. 四叶对的植物名为丝穗金粟兰 (*Chloranthus fortunei*)，常见为四片叶子，对生于茎上部。

10. 桂枝 (*Ramulus Cinnamomi*) 是樟科常绿乔木桂树 (肉桂, *Cinnamomum cassia*) 的嫩枝。

11. 方小平 著 . 董国强, 干霖, 王宜扬 译 . 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 . 2024. p115.

12. 详见：楼之岑，宋之琪 . 本草学对植物学发展的某些影响 // 科技史文集 (第4集). 1980. p128

13. 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曾提出“风土”的概念，来指代某一地方气候、气象、地质、地力、地形、景观等的总称。更多可见和辻哲郎所著《风土》一书。

14. 方小平 著 . 董国强, 干霖, 王宜扬 译 . 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 . 2024. p19.

15. 乌不达，也称乌不宿，是五加科的刺楸或楸木，为有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药”和“三土、四自”为口号。“三土”是指民间医学、民间医生和民间偏方；“四自”是鼓励人们自采、自种、自制和自用中草药——足见当年围绕草药展开的这张“采、种、制、用”¹⁴的社会网络何其庞大。

除了加银阿叔和曹大哥，书院的方山还帮我们联系了在村中太公树旁开店的金女阿姨。见到金女阿姨的时候，她刚从山上采药下来，电瓶三轮车后斗的麻袋里装着不少的岩蚕。阿姨说因为长得像蚕一样，一节一节的，加上大多数时候能在溪边的岩石上见到，就有了岩蚕的叫法。店铺的入口有个下沉式的小平台，金女阿姨拿了二三容器，顺势也搭了个小草药园。她指着一棵树干上半部分密密麻麻布满小刺的小乔木，告诉我们叫鸟不达¹⁵。这名也是很形象了，想来如此扎脚，飞鸟确实没必要在此停留。再到我们进店坐下，闲聊间还注意到阿姨店内的两面墙上，分别贴有写在红纸上的十几副药方，以及用粉笔写在黑色皮面材质上的中药材单价表。我们稍加细看，就又记下了些许像是剪刀草这类极



金女阿姨车后斗麻袋中的岩蚕。图源 / 榉溪·杏坛书院



具画面感的名字，也发现了不少金女阿姨根据方言发言直接找字拼造的药名，像是来发球根、鸟发柴根、山六梨、岩浆等等。

现在回看这部分材料，金女阿姨给草药起名的方式，不就跟汉代造字六书中的“象形”、“会意”和“形声”有着异曲同工之“土”，讲求的是对第一眼或第一感最直接的表达传递，无需经过层层加密式的翻译和打包。英国植物历史学家艾格尼丝·阿尔伯（Agnes Arber）也提到过欧洲早期草药学家撰写植物描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依赖于类比……采用了通俗语言来描述植物”，与如今植物学收到的“过度使用专业术语，已经变得使人难以理解”¹⁶的抱怨截然相反。

这样看来，“土草药”的“土”，除了在讲野采草药跟土地的联系，或许多少也在讲人们在野采的具身行为中跟草药产生的情愫，一种跟泥土一样原始、不着修饰的情愫。



16. 艾格尼丝·阿尔伯 著，王钊 译，植物学前史：欧洲草药志的起源与演变（1470—1670），2024，p188-9

02/ 空间

在翻阅磐安县的档案时，看到一段话：“青山红芍药，山深鸟语娇。尘嚣飞不到，采种自逍遥。”¹意为这片地方的草药野采生活远离尘嚣，而有人所在的地方都是尘世，怎么算得上“飞不到”呢？当然，这对于山水随笔而言，属于是过于较真了，但或许这也意味着“野采”这一行为，是脱离世俗的：向山讨药吃，讨来的是富有自然环境的「气」和「味」的野生药材，其中土壤、湿气、昆虫、微生物复杂的作用赋予了这些“野草”药性，而人工种植的草药失去了这份天然的出身，在土壤、种植技术与经验、品种形状等条件上又比不上大自然来得鬼斧神工，好像总是差一等似的，常听到榉溪村民说：“药效肯定没野生的好的。”因而，“野草药”具有“灵性”，进山采种自然能够帮助我们拂去尘埃。

在卢震和采方山的联络下，我们得以跟孔加银一家上山采常春藤，但由于我们对于植物、地形的陌生，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山里杵着，像不会看导航跟着图标原地打转的游客。一上山，他们便四散而去，抓起树上的、坡上的藤用劲一拽，再用刀一砍，没过多久，一捆常春藤就出现了，然后任由它在原地，他们快速地向山里移动。整个过程的流畅程度，就跟在菜园里摘点辣椒炒菜也差不了多少。下山的时候，我背着一

建造百草园

捆二十多公斤的常春藤缓慢挪动，因为没有什么抓力点，路也不熟悉，我像是趾行动物，只能踮着走。阿姨一路在后面追着说：“我来，我来。”我走走停停还是被阿姨追上了。她一把放在自己的右肩，颇有节奏地留给我一个逐渐远去的背影。他们在山上的时候确实有小说里隐世高人的气质，就仿佛生活在一个叫“药神谷”的地方，掌握着一套我完全不熟悉的生活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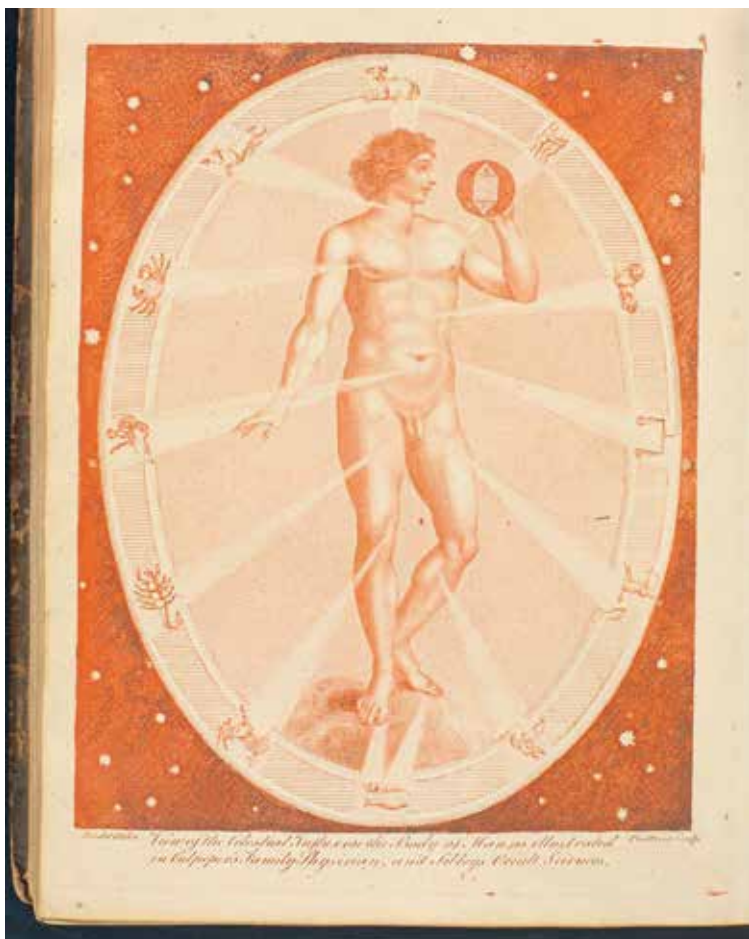
私认为孔加银和他的女婿曹昌丁应该被称之为“药医”，以药为本行医。我很难想象他们如果搬到了山下的城市，药的“本”变了，原来习得的知识与经验该如何发挥作用？

上山是通往“灵药”的道路，下山是回到“尘世”的生活。草药作为“上下山”的媒介，常将“科学”和“迷信”编织在一起。除了观察和经验的积累，这些民间的草药学家们，也潜移默化地将神话、宗教、民间传说中关于植物的认识和解释沿袭了下来。这不仅是地方的、中国的传统，在十七八世纪的欧洲，采集的植物(simples)和人体经由外观和感受被串联起来：人们通过对植物的颜色、形状、图案和人体的特征、疾病的联想，建立

其相关性；或是通过皮肤、舌头对于植物的感受，例如“热”和“凉”、“干”和“湿”，来进行诊疗上的判断²。这种联想依赖于人与环境的生态平衡：我们强调天人合一，但现在的天还是当时的天吗？下山的人是否过上了和山上迥然不同的生活呢？环境变了，不按常理出牌的夏季冰雹冬日艳阳，都足以颠覆传统经验。如果我们追踪医疗传统的历史，其实也能发现时间的推移，意味着人和环境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具体到“这株草药没了”、“患者情况比较特殊”、“这是前所未有的疾病”……那么诊疗方案乃至草药的种植都会随之发生变化。

我长期患有颈椎疼痛，这算得上是信息时代的副作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患者，我去过不同的医院寻求过帮助，有做过针灸、理疗，也看过运动康复和国外脊椎治疗师，可以说我的身体是世界医疗的实验场所。但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生活方式没什么改变，所以往往是治疗当天有缓解，效果维持个一周，但疼痛常伴。想着都来了桦溪，不如打听打听有没有什么土方、偏方，顺便看看药农们自己伺候的草药地，都和山上的野生草药有什么不同。

据说孔加银的药很灵，还有人开几个小时的车来找他拿药。但在我描述完症状之后，只得到一句回复：“要是你骨头断了好医一点，现在这个不用看的。”说完便继续处理药材去了。他们还有一片地在村子里，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经过管理的花坛，有山棉皮、常春藤、红茴香、土黄柏、蒲公英……乱草迷人眼，谁能想到作用于人结果却大不相同。



1. 浙江省林业勘察设计院，浙江省磐安县环境保护局．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01. p17.

2. RHS Lindley Library. "Healing Garden: A History of Medicinal Plants," n.d.
<https://www.rhs.org.uk/digital-collections/healing-garden>.

图片：《库尔佩珀的家庭医生》和《西布利的神秘科学》中描绘的天体流入人体的景象。
 图源 / RHS Lindley Collections



专程前来拜访孔长春阿叔的马来西亚友人。

村里以前的赤脚医生孔长春，现在也不看病了，只会给以前的患者备点药。他的住处是清代建筑的制式，留有一方院子长满了各种草，从野外挖来的种在这里，有红蓼（可以做酒曲酿酒，也可治风湿关节炎）、荔枝草、夏枯草、铁扫帚（或称夜关门，可以清热利湿、消食除积）、龙芽草（或称仙鹤草）……听上去都有好处，但是不对症。这种感觉就像拥有一座宝库，却无法交易。村里沿路都是草药，最常见的就是白英，也是清热解毒、祛风利湿的。其它的常见疗效主要是针对皮肤病、眼疾、关节疼痛、蚊虫叮咬、蛇毒等村里的常见疾病，我都猜是不是“本地草不治外来病”？

最后，我在药农孔金女的仓库寻到了药方。她的空间里有一切我想要的信息：病症对应药方，药材对应价格，沿街有一些草药的盆栽，进去就是晒干药材的仓储，打开一个后门，是一截岩壁，听说有些草药就喜欢长在这湿气氤氲的地方，特别灵的。金女阿姨一一跟我们介绍：岩蚕、竹叶细辛、八角金盘、黄精、岩漿（姜）、蛤蟆衣、七叶一枝花、皂刺、小叶青荊、鸟不达、白芨……学名和土名常混在一起讲，有一些名字也

因为方言读音的缘故成了变种。

可能是因为这个环境太不寻常，听到的故事也非凡起来，没有鲁迅写的“美女蛇”那般奇异，但总归是给植物添了一些灵性：“七叶一枝花（常用于解蛇虫的毒）很难找啊，它起码要两年才可以发芽，我种了一棵在店外面还被撸走了。有一个经常挖草药的人跟我说了一个地方有，我就去挖了。本来是想爬到山上去的，但感觉有个人推了一下我的头，让我往边上爬，一转头就看到三十几棵，长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很大一片。”

金女阿姨的药方也很与时俱进，除了颈椎痛、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咳嗽这种常见疾病以外，还有针对新冠肺炎后遗症的。我们在沟通过程中才大概理解了，其实是有什么症状就用什么药，有觉得灵的药就继续使用。患者有时也是有一定经验的药农，会带着“灵方”来拿药，这与寻常医院的医患关系大不一样。针对新冠肺炎后遗症的有一味药是岩姜（药方写作“岩浆”），据阿姨说原来也没用过，就是爬山的时候看到了就挖来了，替换进原来清热解毒的药方里试了下，发现疗效好了很多。“人身体上就这么一点（毛病），十几个偏方就可以了。”

我向金女要一些药（名为养生茶）来喝。

金女看上去有一些顾虑，说：“你买去的话要坚持喝。前两天有一个人感冒了，咳嗽咳了两个多月了。他胃也不好，要咳嗽要吐，他一个人身上就很多病。我也很纳闷的，我的药人家拿去吃了没几天就通了。他吃了三天，他说还难受，堵得慌。我说，你要坚持了，你不坚持就不行，时间没到，过两天就可以了。他一天不知道打了多少电话，我说你没事的啦，你不要怕，反正那个药如果配出来了就可以了，你放心吃。直到昨天晚上才没有电话打过来。他那个毛病太多了，我就放了七味药进去，经脉堵塞的也要放进去，咳嗽的也要放进去。我打过去说你咋啦现在？他说出去玩（没事了）。不过你的话，颈椎不严重也没什么大问题。”

我连忙说：“我能坚持，痛好几年了。（指向墙面）就是上面那个治颈椎的药是吧。”

“那个是好几年前的了，我不配了，重新换了。”

除了拿药，我又刮了痧。临走之前，金女阿姨再次跟我强调坚持的重要性：“不要说你一天两天就不搞了，你要长期搞的，它自然会好。”

果然，我一下山连着几次出差，就没坚持住。这个时候我才懂了金女阿姨的顾虑，大概是因为我不是村里的人，也没有吃草药的习惯，甚至不知道怎么熬。但是药挺好喝的，清淡的苦味，带着植物的香气，吞下去之后好久口腔里都有回甘，我把它当作鸡汤里放的五指毛桃，心里想着总有点用吧！至于长期主义带来的改变，我无从验证了，只不过对草药多了一层体悟：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大概人体和环境这个复杂系统，我们未知的还有很多。

在告别的时候，金女还提到，她想造个百草园。其实我有点诧异，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长春阿叔的院子、加银阿叔的村中荒野花坛、金女阿姨的岩壁都是百草园，甚至融入生活景观，可以被称为植物与人互相依存的良好范本。患者和看的病也有一些规律可循，纵使采药有诸多不便，但不是说药效总是野生的好，怎么还会想着费心费力去造一座“正规”、“带铁网”的百草园呢？

我唯一想到的合理解释是对于找不到草药的担忧。我们在一份资料中读到：“大盘山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但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由于长期以来人们缺乏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意识，常常采取‘涸泽而渔’的掠夺式经营方式进行采挖，尤其对名贵珍稀药材，更是见了就挖，致使一些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日益减少，有的濒临灭绝。对野生药用植物进行驯化，并扩大种植，是解决药用植物资源问题的必然方向，也是满足人们防病治病用药需要的重要手段。”经济学家称之为“资源诅咒”³，用来描述因治理不善和不正当的自然资源开采而产生的不良影响。

金女是不知道什么“资源诅咒”的，在她描述的百草园里，没有人来偷草药，想买药的人有的用就已经很好了，这类似于“草药下山”的中间阶段，小规模种植需要的草药，但不至于靠此去积累财富，例如：“赤脚医生

采药一开始是单干的行为，当作为经费核算单位的大队发现‘采药’也可以积累财富时，‘采药’就被转化成了一种群体的规范行动。不少大队会专门拨出土地做中草药基地，自采加上自种。药物治疗的成本随之大大降低。”⁴ 据卢震讲，上个世纪 70 至 80 年代，村里有了中药种植合作社，参与者全脱产，不需要做农活，有 13 个人就是种白芍、白术为主。而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大大小小的草药种植园多了不少，并没有替代“野采”这一行为，等于说“资源诅咒”并未解除的同时，规模种植带来的衍生问题又来了。

即便问题如此复杂，人类也从未停止过对于野生草药的驯化，选择种植好像是一个不需要过多思考的集体决策。

在寥寥几笔的文献中，我国的药用植物园经过了几次命名的变化。最早雏型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神话《穆天子传》云：“春山，天下之良山也，宝玉之所在，嘉谷生之，草木硕美。”春山即昆仑山，山巅有玄圃，是传说中的神农药圃，为培植灵药的地方。故后来屈原在《楚辞·哀时命》中有“愿至昆仑之悬圃兮”的憧憬。但玄圃之说仅是传说而已，并没有确凿史料予以佐证。但我们大概能够捕捉到玄圃、悬圃、县圃之称谓带着点仙气。秦汉时期的皇家园林，上林苑，则是有史书记载的我国最早的古代植物园，比欧洲现代植物园早 1900 年，虽然在名字上并未提及药效相关，但上林苑从南方引种的菖蒲、山姜、龙眼、荔枝、橄榄、柑橘也等多是药食同源植物。目前能追溯到的“药园”一词，则最早出现在北齐时期（550~577 年）的诗词中：“千金买药园，中有芙蓉树。”这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药用植物栽培业的迅速发展⁵，但这些稀奇的豢养植物依然是权贵的游戏。当然，从“玄圃”到“药园”，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人类对于植物药效认识的变化，即使这个变化在社会集体中有参差、有惯性、有时差。特别是，当人类开始关心种植技术时，其实也意味着，“仙气”是可以被培养的，那么不再遥不可及的神话就只是民间的传说。

3. 浙江省磐安县环境保护局：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考察报告。2001. p36.

4.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 p380.

例如，“魏晋时期，随着贵族、文人园林的崛起，修仙长生之风从帝王向下延伸，贵族园林中也出现以长生为目的的草药种植。人们获取药用植物的方式，从早期的求之仙山、名山，转变为在近山采药和在园中种药；对药用植物功效的期待从虚幻的修仙长生，转变为更为实际的养生祛病”⁶，北魏的官员贾思勰也完成了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齐民要术》。

唐代已建有药园，但在《新修本草》中仍乏有关药物栽培的记载。直至宋代苏颂修《图经本草》时，才多有着墨，述及牡丹、地黄、茜草、安石榴等植物的栽培。隋唐太医署加强了中药材种植、鉴定管理和药学教育，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药用植物园最为兴盛的时期，药用植物园在这段时期不但有药园、药圃称谓，也出现了药栏、药院、药畦、栽药圃、采药圃等名谓⁷。北宋医科学校承袭唐制，在都城开封近郊开辟药园种植草药，凡医学学生都要到药园学习，“辨识诸药”，以避免假药泛滥，耽误病人……司马光的《独乐园记》记录了宋熙宁四年（1071年）独乐园药圃状况……独乐园药圃至少分为3类：草药、蔓药及木药，按现代分类学，就是草本、藤本和木本草药，这是迄今发现古代药用植物园草药分类的最早记载⁸。

对民众来说，草药历史中最著名的高光是明代李时珍的著作《本草纲目》。而对于药用植物园的技艺承袭来说，不可忽略医学家陈虬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浙江瑞安创办利济医学堂之事，这被评价为我国近代中医药教育之始。其不仅设有生药局和鲜药圃，提供了从草药到药材的丰富样本，陈虬还提出“读遍图经千部，不如栽药一区。”倡导学生知医识药，要求学生积极深入药圃，提高药物辨别能力⁹。

而进入到现代的历史，则又是另一番天地，草不仅作为药，也作为种质资源。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药材需求大幅增加，野生药材日趋紧缺、枯竭甚至灭绝，栽培药材供应市场需要并保护种质资源就成为当务之急，现代药用植物园也就应运而生。四川省在20世纪40年代创办了我国现代第一座药用植物园¹⁰。

世界的历史似以水投水，欧洲的植物园也从几百年前的“皇家草药园”，

发展到现在依据植物分类科学规划的现代植物园。植物园在当时也被称为医师园（hortus medicus）或学术园（hortus academies），既可以促进医学的发展，也可以培养研究植物学的专业人才。在以药用植物为中心的草药园的基础上，扩展出一个更大的植物板块¹¹。



榉溪村野采后常见的留种植物——南丹参。图源 / 榉溪·杏坛书院

-
5. 袁经权, 缪剑华. “我国药用植物园的历史沿革”. 中国植物园 (第十二期) .ed. 广西药用植物园; 暨南大学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所, 2009, p7-8.
 6. 刘珊珊, 黄晓. “中国园林药用植物造景的思想源流.” 中国园林 40 . 08(2024): 24-29.
 7. 袁经权, 缪剑华. “我国药用植物园的历史沿革”. 中国植物园 (第十二期) .ed. 广西药用植物园; 暨南大学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所, 2009, p8.
 8. 同上, p9.
 9. 同上.
 10. 同上, p10.
 11. 张德顺, 孙力, 科林·吉尔伯特, 尹伊凡, 姚驰远, 姚鳗卿. 国外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园发展的启示——以巴黎植物园为例 [J]. 城市建筑, 2022, 19(15): 186-190. DOI:10.19892/j.cnki.csjz.2022.15.43.

不过我们在禅溪所看到的远不止这些。我们可以看到金女阿姨对于草药挖掘的描述上仍带有某些神秘色彩。曾开过医院的孔令木在自述《我的人生坎坷》中也提到一段有意思的描述：“民间秘方特认真的。什么品种、季节、雌雄、形状、性味、阴阳等特别讲究。你不但要认真的看，还得学会品尝，同药同貌但不同味，作用就不一样。有的还强调当天的采药时间，然后的佐料、辅药、水、熬药时间、火候等都有严格要求，还有的讲究迷信色彩，你不信也得认真执行，否则你就什么也得不到。”所谓的迷信、神迹，但凡是科学无法解释，可以用带有传说色彩的故事相传的现象，都可以视为“神话传说故事的惯性”；赤脚医生作为“轻中重西”时代的产物，见证了传统中草药的衰落和转型；禅溪村里面除了专门种植药材的田地，村子里角落缝里都长着草药，村民们掌握的种植技术更多来自于经验而非专业的医学教育……民间所谓的百草园更相信“日用”原则，且在日渐月染之中，兼具了适应性和效率。药园的历史是从神仙、权贵开始讲述的历史，而禅溪所建造的“百草园”如星星一般散落于村中，是从村民开始书写的历史。



明代仇英所绘《独乐园记》中的采药圃场景（局部）。

03/ 系统

从名称上看，土草药本身就与现代化的发展意味相去甚远。土草药、土验方、土医术……我们习惯以“土”字讲究一个民间、道地、野生，甚至带些夸张的奇幻色彩。处在以道地药材为长的磐安县，榉溪村也带有十分明显的、逃离现代化体系的“土”味：村口医馆门上挂着的野生中药材粉笔字手写板、家家户户门口种着草药的土盆、村民口口相传却在药典里查无此名的民间药材叫法……现代医学的崇尚者往往会对土草药，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草药、中医，都带些偏见。在现代化的体系里，如果医药是没有“科学根据”、没有精细化标准的，那就容易被当成“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传统民俗，仿佛无法建立横平竖直的定义框架，就无法被理解或认真对待。

这种现代化的逻辑在榉溪村似乎并不通行。我们被卢震和采方山领着，沿着村里各个大路小路走了好几圈，再跟孔加银一家上山采药，看仁川镇应大哥自己家的贝母田，听曹昌丁讲怎么切片和保存黄精，最后体验了一把金女阿姨的秘方草药茶。每个村民对于“土草药”的“土”似乎都十分认真又深信不疑，家家户户对土草药的“采、种、制、用”如数家珍。土草药的种植和使用与村里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着，几十年来村民们仍如一日地身体力行。

土草药与现代化

当下村里这些仍在种草药、用草药乃至开草药方行医的一代，几乎都已逾耳顺之年，也因此是深受上世纪“中草药运动”影响的一代。自1958年起，为解决中国农村地区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合作医疗制度开始不断在全国各地推行，榉溪村也于1967年1月，正式有了“盘峰公社榉溪大队医疗室”的挂牌。但在合作医疗制度推行的首个十年里，全国的药品供应体系仍基本以西药为中心进行建构和发展，“中草药”几乎不出现在官方文件或新闻报道中。自1971年起，面临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和国际冲突局势下愈发紧张的西药供应，为了满足当时国家医疗卫生规划的需求，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地开始大力倡导中草药和民间疗法，自此才开始为中草药正名、合法化。中共安溪公社党委于1975年的档案中记录称：“中草药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其保存、加工、使用也相对简单，容易掌握。人民群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充分发挥中草药的作用可以满足贫下中农的用药需求，进而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促进社会主义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是开发药源，实行勤俭办医的一条重要途径，是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条重要措施。”¹

在各地公社卫生院的带动和赤脚医生的行动下，“许多‘百草园’和民间



赤脚医生遍山村 合作医疗气象新



山村医疗站 (潘世平画)

药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村庄”²。据当时在浙江省余杭县蒋村任公社卫生院院长的陈志成回忆，卫生院大多“指定一名员工负责草药的种植、采集和加工。一小块土地被划出来用于种植草药的，旁边还有一个房间专门用于草药加工。”³但同时，由于种植面积和种植的草药种类有限，农村主要的中草药来源也大多依靠当地野采，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们往往要在村子周围采集各种野生的草药，再带回到诊所加工、切片和干燥，甚至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家家采草药”的情况⁴。和蒋村一样，榉溪村也依照着同样的方式，种药、采药、用药，甚至成为了当时东阳全县的合作医疗示范点。在领导带头下，解放后成立了最初由当地八位民间医师组成的“芍药种植小组”和医疗团队⁵。也是赤脚医生的孔长春阿叔告诉我们，办农村合作医疗社的时候，用到的草药大多是他带着三个老药农（孔祥太、孔森木、孔文位），捡空的时候到周边山里去一一采回来的。当年最早加入榉溪大队医疗室一员的孔令木阿叔，在他的小传中写到：

我在各地药农及国内知名中医药老师的带领下爬遍了邻县的山沟角落。我们靠自采的野生草药及其制剂辅以针灸等为患者免费服务。献方、挖掘、实践、总结推广的气氛空前高涨，大家抢着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根本没有惧怕。我细心的把药品在人体上的反应记录下来，大小资料积累可能有上百斤，这五十余年来我在自己身上进行过上百次的亲身体验，左手臂还留有五十年前的体验疤痕。

1. 中共安溪公社党委：《在斗争中坚持推广中草药》（1975年4月11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卷号：42-1-51。

2. 方小平 著；董国强，干霖，王宜扬 译；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2024），第113页。

3. 同上，第112页。

4. 方书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草药群众运动研究（2022），第23页。

5. 据孔令木回忆，八人团队包括孔汝东、孔森木、孔文位、孔祥太、包童法、孔令弟、孔万茂等。

今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随着集体经济解体四十余年，也并不是所有村子都像是桦溪村这样，村民身上多多少少留下了“中草药运动”的痕迹，甚至由这一运动定格了村庄的空间格局、生活方式和生产景观。外部现代化发展没有大面积进入是一方面，村民的习惯和更难说清的“土”情怀，可能起到了更大的内部作用。孔长春阿叔告诉我们，即使是小时候十三四岁的时候，还没做上赤脚医生，他也有时间就去周边采集龙胆草、前胡、何首乌、山麻皮、香茶菜等中草药，回家晒干后拿到一年四季都开放的樟村合作社收购站去卖。耳濡目染地做上赤脚医生后，长春阿叔几乎每日不停歇地帮乡里乡亲看病治病、采药制药，直到现在尽管一年到头也看不了几个病人，但他依旧保持着让自家人上山采药、自己用药、定期晒药的习惯。卢震老师说，像阿叔这样的医生在乡里都有口皆碑，有的时候大家一问就摸着来了，而阿叔也能清晰地记起每一个他曾面对面医过的人。

这种“治病救人，解除病痛”的愿望似乎一直对长春阿叔，对孔令木，以及对更多的桦溪村村民而言都未曾变化过，也因此保持着朴素、空泛的状态，无法通过现代化的语言体系被解释，甚至带有些过时的个人英雄情结。土草药的“土”也正开始于此。孔令木写到土草药时，总反复强调这是“特别认真”的事，无论是草药本身要认真讲究品种、季节、雌雄、形状、性味、阴阳等等要素，还是行医者要认真的看、学会品尝、分辨作用。草药总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几十年来与桦溪村的历史、气候、水土、情怀都交织在一起。



边缘化的土草药

尽管以孔长春为代表的赤脚医生们，仍然在村里常年保持着对中草药的学习、培训和医疗实践，但自1977年起，中草药运动也因其作为全民参与的庞大规模，在乡村中出现了一系列因“土”而生的采药、种药和制药问题而开始式微。由于采药者的个人经验不同，常有对药材成熟度缺少判断，就过度采集的浪费情况⁶，更不用说村里若是发现名贵草药后，村内村外都纷至沓来一律采尽挖绝造成的药源破坏⁷。虽然政府后来鼓励医疗合作社进行中草药自种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采药的问题，但又因药农种植经验和方法不一，各“百草园”在农药、肥料和水土上常有控制不当，也多见药材品质问题。甚至在运动期间，各个公社、大队急速发展的简陋“土药房”、“土药厂”也大多是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实际生产的中草药制剂在治疗实践中甚至多现事故风险⁸。

到198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定》，首次提出中草药使用的标准化，并设置诸多严苛规定，从而使得县级医院之外的医疗单位皆数禁止制备中草药注射液，甚至产生“如果发生医疗事故，医生个人必须为失误承担责任”的规定。伴随西药供应增加后大举进入乡村的冲击，以及对此前“过度夸大土方、验方的作用和不正规的药物生产检测”⁹的批判下，中草药、土草药逐渐带上负面和恐惧色彩，在乡村医疗体系中逐渐被限制和边缘化。在长春阿叔的医疗室里，除了采药的锄子、赤脚医生的教材、装着土草药的塑料袋，各处也显眼地放置着血压仪、注射器、听诊器、西药塑料罐等等。

中草药的被动沉寂一直持续至1996年，科技部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提出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战略，核心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托发展中医药、有机结合中西医。因此，无可避免的，土草药原本对地方水土和地方经验的强调，也在科学化、规范化的模式下消隐于主流叙事之中。打开今天的现代词典，土草药、土中药指“药材的来源地不是主要的中药产地”。其中，“主要”二字是指经过国家认可的“地道药材”



长春阿叔家挂着听诊器的墙面。

-
6. 段致静、梅运筹，《保护中草药药源》，人民日报 1969-08-30 期，第 3 页。
 7. 人民解放军某部中草药研究小组，《大家都来保护中草药资源》，人民日报 1971-03-29 期，第 3 页。
 8. 广东广州市药品检验所，《深入农村，促进中草药制剂质撒的提高》，《新医学》，1978 年第 1 期，第 1 页。
 9. 孟庆云，《“文革”时期的中医混沌现象》，《中医药文化》，2008 年第 5 期，第 41-42 页。

主产区，这些地区是质优效佳的代名词、是经过标准化考评下的优等生”。因此，冠以“土”字则意指那些非道地产区的同种药材，土草药虽不是假药，但也并不“正宗”。

在“中药现代化”战略提出后的连续两年，国家先后启动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和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再到2002年，国家制定并下发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和《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将“标准化建设”列在重点任务的前列。时至今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也制定了完整的建设标准和管理办法，中药材的种植、采收、炮制完全成为了有明确数字目标、可量化标准的现代化管理过程。一方面，成科学体系的产业当然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据记录，2022年中国中药工业产值达到7500多亿元，较发布“中药现代化”前增长了30多倍。有研究者也提出道地药材作为“商标富农工程就是要通过品牌化打造道地药材等农产品的高附加值，让农民留在土地上精耕细作，让农产品流通出落后地区，实现农民脱贫致富。”¹⁰

另一方面，“道地”、“现代”、“科技产业”带有强烈的还原主义（Reductionism）色彩，最首要满足的是资本增值的需要；而“土草药”的故事从地方生长而出，带着更多元的天地人因素，与象征多元利益平衡的整体主义（Holism）呼应，尽管它难以定义、模糊不清。当仅有还原主义的单一叙事被强调时，原本的“土”故事就无法在地方之外，寻找到更多认同和发展，也就意味着有部分人、部分物的利益不得不被排除在外。在榉溪村，从医55年的孔令木和我们描述了他近年来的观察与担忧：

我们进行了市场调查，了解到许多药材的炮制工艺是不符合传承要求的，举几个简单例子吧，我儿子腹泻用的救命方中有姜半夏，公司进来的外表很漂亮，个大、均称、雪白，配方用于病人疗效却很差……后来我发现，个大均称是人工培植原因，雪白是漂白粉与硫磺粉漂出来的。再说松节一药，师傅要求有香气，有暗亮透明的松索条，而且遇火即燃，但是公司进来的只是普通的松树小枝条加工而成，味淡枯干，想烧着得加助燃剂。比如说八角枫

吧，我们要求用侧根称白金条，须根称白龙须，但是采挖成本太高，市场上根本就无法买到，公司进来的且不提细根，许多还是地面上的枝杆。还有接骨木、杜仲、四叶对等等许多药材质量根本达不到要求。

我们在桦溪的最后几天，到访了隔壁仁川镇从事贝母种植的应大哥一家。与此前接触过的村民不同，应大哥的自宅已近似一台稳定运作的工厂，这里没有什么随意散乱的草药枝叶，门前空地、客厅、后院、地下室，都井然有序地设置成为晾晒、清洗、切割、烘制、储藏贝母的功能性空间，与应大哥一家的餐桌、沙发、生活用品等等交错陈设着。在桦溪村里，应大哥单独承包有一片贝母田，他和他的家人们每日反复进行着“浙贝母”的种植、采收、加工，与中药市场博弈，以在最合适的价格出售辛苦劳动的药材。数年间，他们既有大赚的年份，幸运变身村中大户；但也时常有歉收亏本的日子，以一句“不走运”再回到田间耕耘一年。离开之前，我们拿走几颗在地下储藏还未切片的贝母，应大哥告诉我们，这就是贝母的种子，中间有几颗芽就能再新种出多少个贝母来。浙贝母作为“磐五味”、“浙八味”之一，在磐安的产量已占全国浙贝母总产量的60%以上，严格意义上不再是现代词典里的“土”草药，而是中国道地药材的著名代表之一。我们问应大哥的夫人，他们的贝母种子是否也就来自桦溪村里的土地，追随“道地”的极致标准。她却告诉我们，其实每年他们都从江苏，购买一批浙贝母的新种子来，比自留种种出的反而存活率更高、质量更好，“也不能每年都用自己的老种子，种不出好的。”现代性的框架不因地方之土而改变，地方的人、地方的药尽管处在框架边缘，却也总是不得不为了框架通行，进行自我改造。

10. 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道地药材与地理标志关系研究》（2021）。



图片：应大哥套种番薯的贝母田。图源 / 榉溪·杏坛书院

* 注：每年五月份左右，当季贝母采收之后，应大哥就将留种的球茎就地开沟，深埋回到土里，再在上面起垄套种上番薯。等到十月份番薯采收，他再把埋在番薯下面的贝母球茎挖出来，顺势种回到重新起好的田垄上，番薯藤顺势可当作贝母田的地表覆盖物，省去了不少割茅草的时间。

固化的医者与学生身份

无论是应大哥这样承包农田的药农，还是孔令木、孔长春这类接受过医疗培训教育的赤脚医生，每每和桦溪村村民对话完，我们反而更难为他们的身份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他们在不同时刻和不同场景下的角色如此不同，而这些角色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切换又犹如流水般自然。在金女阿姨的医馆中，她用她的双手支配着所有黑板上的药方、推拿着我们脆弱的肩颈肌肉、修剪着门前的土草药植株，她同时是药师、推拿师和药农。但偶有其他懂土草药的村民、甚至曾是金女阿姨的患者来访，互相交流近日身体情况之时，她又成为了听取他人药方建议的患者。在桦溪的土草药世界中，医者和患者之间似乎并没有分明的界限，大家只是同样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用这一方土地之药的人罢了。

中草药运动盛行前，这种身份的灵活多变性在“赤脚”二字中仍依稀可见。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官方话语一再强调，赤脚医生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参与农业劳动：“要成为一个好的赤脚医生，首先是要成为一个好社员。不参加劳动，就不算是赤脚医生……”¹¹随着中草药运动盛行衰落，赤脚医生们先后“穿上鞋”，成为了大队中富有医学知识的特殊“精英”们。但这并不代表赤脚医生拥有更高的特权，相反，在中国乡村，由于紧密的人际关系所形成的信任网络，赤脚医生是被患者选择的被动角色，只有“自己人”都说好的才是好医生。“作为其所在村庄的一员，他们了解自己服务对象的各种日常问题。他们一直待在农村，因为那里是他们的家。他们的病人是他们的邻居、劳动伙伴和亲戚，他们的工作给了他们极大的满足。”¹²

这种平等、多元的医疗关系，在中草药现代化浪潮后也逐渐被打破。尽管原本赤脚医生就因个人行医经验累积，开始掌握更多患者的信任，即也占据更加主导的地位；但更加流程化的行医方式、更多标准化中草药制药技术的进入，甚至是规范化的中医病证诊断和疗效评价，都在让原本近乎平衡的权力天平，不断往医者那侧倾斜。“在传统中国乡村社

会的多元医疗体系中，专业的、民间的和大众的传统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各种疾病，并采用不同的药物来加以医治。”¹³ 今时今日看来，现代化的转向让原本多元的医疗体系归于统一，也因此让医者和患者的身份及所有权力趋于固定。

卢震老师最后带我们去到隔壁县，拜访了想在榉溪村开设新炮制工坊的年轻中医师农医生。他的医馆是在横店城里热闹现代街道上的一间店铺，陈设有古色古香的木药材柜、茶台、中药科普板，农医生也同我们反复强调地方土草药的珍贵、对土法传承下来的炮制工艺的重视。但同样让人感到格格不入的，是医馆里标准化的白色病床，是略显浮夸的药材展示大玻璃柜，也是来来往往总从窗户外投来目光的居民游客。孔令木说：“治疗效果是医生的命根，它所反应的经常立竿见影，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当然不是说现代化的中医馆或中医师全数是虚假的精英主义，但我们所感到的无力，可能也与这刻板形象、医患关系息息相关——毕竟土草药所代表的那种人与环境、草药与环境、医生与患者的良好互动已经偃旗息鼓好久好久了。

11. 富阳县卫生局：《卫生简报：金关焕同志的来信》（1976年6月20日），富阳市档案馆，卷号：74-3-26。

12. F.P.Lisowski,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refoot Doctor in China," in *History of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Medicine: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edicine-West and West*, ed. Teizo Ogawa (Osaka: Taniguchi Foundation, 1987), 154.

13. 方小平 著；董国强，干霖，王宜扬 译；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2024），第97页。



04/ 反思

人类学家赖立里在回顾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医药调研经历¹时提及：本草知识既是在地的，也是普世的。或者说，我们在看待地方性知识的时候，常把它当作显微镜下的培养皿，却忽略了它与普世知识的互动。在桦溪村的几次短期走访，我们不得不承认关于草药的研究的确是困难的，采药人对于草药的亲密情感和身体性知识，很难被提炼为系统化的“科学知识”加以推广，如果研究者不能身体力行地践行，仅仅是作为旁观者来观察书写，那真的谈不上深刻理解。

我们能做的是跟大家诚实交代遇到的困难：

进入田野，我们需要通过“中介”，也就是药农，才能接触到草药。而药农具有身份的复杂性，“中介”不同，我们接触到的草药面貌自然各有千秋。像孔长春是接受过赤脚医生培训的，对于全科的一般病例都有一定认识，我们认识的是已经退休的他，草药闲撒在院落里，不求珍稀求安心；孔加银更像是一个治疗骨伤的专科医生，女婿曹昌丁得其传承，家里的药材库存、处理、售卖都很利落，在村里也算得上小有规模，我想象中的知名药房“胡庆余堂”早时候也是这幅光景；孔金女更接近村民

草药地 缘研究

自治的模式，接待窗口也在小卖部边上，甚至种下的药也偶尔被人偷偷薅走，她的小店履行着部分公共服务的职能；返乡开药房的孔令木颇具乡绅气质，只是可惜已然不是草药的全盛时代，村民患病也常选择城里的大医院。村子里还有各色人物，他们对于草药的认识深浅不一，很可惜我们没能一一走访。笼统而言，草药通过不同的“中介”，给这个村子形成了一层即时的健康屏障，它融入了生活惯习，易于理解、方便触达。同时，村民除了是患者，也是“中介”。他们都或多或少掌握了这项技能，能采药、能种植，知识没有被隔绝，才算得上与草药共同生活。

陌生的田野具有不可阅读性，难读（unreadable）的特性是由田野的陌生程度与阅读者的经验和知识系统共同塑造的，所以我们总是爱用一些模糊的修辞去尝试接近它。“草药的地方”更甚，城市环境在近几十年发生了巨变，不仅让我们离活的草药越来越远，还让我们在认知上隔离了与“地方”的联系。所以，草药与地方的联系常会被抽象成“产地”二字。我们唤其为产地时，就将自己代入了消费者的姿态，这一称谓意味着我们认为草药的种植是集体种植行为，或不属于“我”的周遭生活。而且现代生活不知为何，对知识和实验室极为推崇。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研究把产地的土壤气候等生态因素对中药药效的影响视为一个重点研究方向——从摸清草药的自然分布规律，到寻找新药及扩大新药源，再合理布局栽培生产，实现草药在模拟生态系统中的人工驯化——条理清晰地被编入了“中药地理学”、“天然药物地理学”这类的专有名词。这些概念都认同“产地本身就是一个多因素的复合体”，而对“复合体”包含的具体内容，重心全放在了像是生态地质或自然地理等这些能被精准数据化的科学因素——“其中温度、湿度、土壤、光照、大气以及生物之间种群竞争等综合地影响着药材的品质”²。当民间离开了与草药相伴的生活，研究者关注的是数据而非草药活体，那自然我们面对鲜活的草药生命时，不知如何是好。

借助数据科学地编码定位草药被认为是严谨的，近年还有将分子谱系地理学的描述方式应用于药用植物的研究，来介绍草药的道地性、栽培或养殖起源等故事³。与此同时，人类社会那些不易量化或难以被科学描述的要素，在当前关乎草药的“地理学”讨论中常会被选择性地搁置。在榉溪村的田野观察中，我们就频繁地感受到了，手机中查询显示的百科介绍和村民分享的实践经验这二者时常会有的撕裂感。面对这些会“跑”的草药，我们怎么就能断定当前掌握的科学信息能划出这种草药的“地理学”？换言之，草药在流动中凝炼的时空经验，是能被分毫不差地收纳到现代地理科学的知识框架中吗？村民常说今天在这片林子里找到的药，明天就没了，不知道是被人挖了还是不长长了，养殖的又没野生的灵。研究菌菇的朋友说，野生的菌子带有的土壤香气，是种植的没法比的。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草药种植的价值，只是，站在村民的角度出

发思考时，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草药、植物、环境的认识还有很多不足。

认识的不足或许还可以从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轨迹中寻得一丝线索。我们现在熟悉的“地理”或“地理学”是在 20 世纪初期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地理学，学科命名则借鉴了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将英语的“geography”对应为“地理”的译法。学者杨汝万和周一星在上世纪末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将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尤其是人文视角的地理学研究脉络，归纳为四个阶段⁴：

西方现代地理学在民国随着欧美留学生的归国而传入。他们引进欧美国家时兴的研究方法，强调实地调查和因果关系的论证，提出了如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等更具人文视角的地理学研究。张其昀曾称这一时期是“借自然科学为其基础，而解释人地相应之关系，中国人文地理学之研究，亦因此而面目一新”⁵。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向苏联学习的纲领转向，让源自欧美的西方现代地理学研究成为了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特别是人文视角的研究倾向被认为“只不过是一门理想主义的哲学”。在这样的时代情绪中，受过西方人文地理学训练的学者，要么转向更偏自然科学视角的地理学研究，要么以农业为对象展开经济地理学的工作，服务于大规模的国家调查。

再往后的六、七十年代是地理学学科研究整体缓慢推进、甚至停滞的时期。由于农业发展在当时被视作经济建设的基础之一，与其相关的经济地理学成为了仅剩的研究切口，而发轫于民国时期的其他人文研究路径，像是聚落地理学和人口地理学等，成了荒芜之地。

地理学在八、九十年代再次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人文视角的方法路径也得以重新进入地理学的学科研究。在经历了前几十年的失衡发展后，经济地理学成为了这一发展时期的主角，还因其与宏观的战略研究和国家发展间休戚与共的联系，变得更密不可分。

人口地理学，则是另一个在时代特有背景下，进入地理学研究主要发展名单的人文话题。

在进入中国的百多年里，西方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话题，从最早百花齐放的取长补短，到人文视角在特殊历史时期被大部分地搁置回避，再到学科整体复苏后特定人文话题的重点经营，其具有的人文倾向被不断压缩，而以科学为名的自然路径始终未曾间断，并在地理学的学科研究中被不断强化，甚至推崇。现有的科学研究也因而更关注物理环境，常常遗忘社会政治环境和人文要素在其中的作用⁶。

如此一来，本身就面临地理科学化危机的现代地理科学框架，在面对会“跑”的草药及其流动的经验知识时，其科学化性的地理定位、或是以产地为名的销售标签，都很容易成为一段冰冷的草药介绍，使我们难以看清一株有生命的草药与地方的交流过程。

2. 丁贵祯. “试论中药材产地.” 中草药 06(1995). p326-8.

3. 分子谱系地理学由美国进化遗传学家 J. C. 阿维斯及其同事在 1987 年提出，主要研究生物种内和近缘种间基因谱系地理格局形成的原理和过程。近年出现的药用资源分子谱系地理学，即为分子谱系地理学理论与中药资源实际问题相结合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药道地性的遗传基础、药用植物栽培起源、药用动物的驯化、药用动植物遗传多样性、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中药材产地鉴别等。

4. 详见 Yue-man Yeung, Yixing Zhou.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evolution, rejuvenation and prospect.”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5, no. 4 (1991), p373-394.

5. 张其昀. 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上）// *地理学报* 2. no. 3 (1935), p93.

6. 就地理学中人文和社会科学要素的遗忘，人文地理学家朱莉·卡普尔斯（Julie Cupples）曾围绕“地理科学化（geoscientisation）”论述了在理工学院和文学院系重新定位地理学的过程中，批判性的人文地理学无法找到明确定义和归属的状态。原文见 Julie Cupples. “No sense of place: Geoscientisation and the epistemic erasure of geography.” *New Zealand Geographer* 76, no. 1 (2020), 3-13. <https://doi.org/10.1111/nzg.12231>.



看见植物

植物也有着悠久的不被阅读的历史。在关乎自然系统的反思中，我们最先看到的，大多数时候是跟我们自身更接近的动物对象。对于植物的反思，总是会来的要晚一些。这种现象在上世纪末美国的中小学课堂中便是如此，相关的数据统计发现学生们在生物课程中，往往会更喜好动物话题，而不太注意固定不动且颜色相似的植物对象。由此，美国学者汪德西（Wandersee）和舒斯勒（Schussler）提出了植物盲症（Plant Blindness）⁷的说法，强调我们在视觉和感官认知上对植物有所轻视与忽略的现象。

同样的“植物盲症”也发生在人文地理领域近三十年来的研究转向中。动物议题作为新千年后人文地理研究的新兴关注点，被视作“透视‘人地关系’的重要棱镜”。相关的研究意在重新认识动物与人类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重视动物们能跟人一样“主动地建设和创造世界”的本能⁸。这一转变也被称为动物地理学的第三波思潮（the third wave of animal geographies），或动物地理学的人文转向。对于动物地理学的这波研究转向，安娜·劳伦斯（Anna Lawrence）就提醒说其过快发展成型的框架是存在一定风险的——没有充足的时间让真菌、细菌、昆虫或植物等对象同等地进入这波人文转向的理论框架和伦理想象。劳伦斯还基于现有文献的整理，对人文地理学科转向中的“植物盲症”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虽然也有学者从农业、城市环境、野生觅食和生物安全等语境出发，希望认真对待植物，但目前所形成的研究方法都过于细碎⁹。

植物尚且如此，草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其当下的失语者处境也是不言而喻。但同时，草药也不只是植物世界里的芸芸众生。至少我们在桦溪村打过交道的、流动于多个时空里的草药们是有着穿针引线的独特之处的——能帮助我们重新正视“草药地理学”中曾被阶段性搁置、甚至开始被逐渐遗忘的部分——当我们把人在环境互动中累计的人文要素加入关乎草药的“地理”认识时，现有的“草药地理学”还会是妥帖的描述吗？



7. James H. Wandersee, Elisabeth E. Schussler. "Preventing Plant Blindness." *The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61, no. 2 (1999): 82–86. <https://doi.org/10.2307/4450624>.

8. 详见：廖健豪，蔡浩辉，陶伟。“重新认识人类与动物：西方新动物地理学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 41, no. 11 (2021): 1980–1991.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1.11.011.of geography>." *New Zealand Geographer* 76, no. 1 (2020), 3–13. <https://doi.org/10.1111/nzg.12231>.

9. A. M. Lawrence. "Listening to plants: Conversations between critical plant studies and veget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6, no. 2 (2022): 629–651.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211062167>.

看见草药的地方和流动

相较于在学科化进程中变得模糊不清的“地理”或是“人地关系”等语汇，我们更希望记录的，是榉溪村民以生活为中心，透过草药的采集、种植、炮制、使用的过程，与地方环境形成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也让草药在榉溪当地的存在和流动是一件有所缘由、有迹可循的事情。草药的地缘，即草药在地方的缘由，在我们看来，会是一种比“草药的地理”更中性的提法¹⁰，地方性和流动性则是我们在“草药的地缘”中讨论的关键词。

在有人类参与的、第一次大范围的植物移动，是在公元 15 世纪以降的物种大交换。植物跟随远游者的步伐，前往世界的角角落落；冒险家们同样也在一次次的远航中，寻找有用之物，其中，来自异域的药用植物就是当时欧洲殖民者们寻觅的重点之一。就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全球史书写，在新千年前后，以科学史学者隆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在 2004 年出版的《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为代表，开始关注植物在跨区域或跨国引种的流动中和不同社会群体或区域发生的联结变迁，进行全球殖民史的反思和植物文化通史的写作。有关药用植物的特定研究和书写，同样也生发于相近的时刻，像是科学史学者韩琦在 1999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中编排的“中国植物、医学在欧洲的传播”章节，或是近期历史学者高晞和何安娜（Anne Gerritsen）共同主编的《本草环球记》中对大黄、阿魏、人参、丁香、中国根等跨地区医药产品、1600 多年长时段足迹的追踪。

草药地缘的流动性除了跟近二十年兴盛的全球史书写密切相关，我们在榉溪和当地村民的交流中，还发现以贝母为代表的、所谓地方草药，在如今的现代产业化生产中，同样有着远超植物本身所能移动范围的流动轨迹——从江苏盐城大丰采购的贝母苗，由货车运到近六百公里远的磐安县种植，待成熟收成后，贝母在县域内因采收和加工经历小范围的流转后，再进入省外各大制药公司的仓库。是以，在有关流动性的追溯和书写中，我们不单会关注草药在历史记载里、多与殖民大交换相关的

全球路径，同样也会梳理这些被称作道地药材的草药是如何在现代化的产业布局里被环环安置的。

当下的人文学术研究，在论及草药的流动故事时，往往还会关心知识是如何在地方草药的移动进程里产生、交换、流转（circulation）、翻译、传递（transmission）、接受或不被接受的。譬如，前文提到的《本草环球记》除了对医药产品进行追踪，还关心“贸易与全球医药产品流通及健康知识生产的关系”。学者边和在《药之为物：明清的本草与知识文化》中提供的观察药物与知识文化的独有视角，或是冯珠娣和赖立里在合著的《上山采药：中国南方山区的民族与知识》中对“少数民族医药”概念的挖掘，都在提醒我们，“草药地缘的流动性”并不会把草药视为一个静止的对象，而是要看到流动性所指向的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a process of becoming）。同时，对于这个过程的关注和理解，我们可以从“知识”和地方草药的组合中找到切口的。



10. 这也跟“地缘”一词在较长时间内没有明确的定义相关。沈伟烈在“关于地缘与地缘政治的思考”一文就提到地缘一词到2012年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释义出现，他认为“地缘既有地理的内涵，又是地理的延伸”。详见“地缘看世界”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sBd23nM9cs0k2M0noki3mQ>

当我们把视角聚焦到知识是如何在地方草药的移动中进行交换的这一话题时，很容易就会触及“草药地缘”的另一个讨论关键词，地方性。我们关注的不只是草药在流动中于各地方间产生的知识交换，还有人类学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提及的“实际知识（know-how, savoir faire 或 arts de faire）”，一种在被“科学知识”认为不重要，甚至是危险迷信的地方实践技能。在“草药地缘”触发的“地方性”讨论中，我们将特定环境的地方知识视作与流动的一般科学知识同等重要的存在，试着看到并展现这些地方知识持有者饱含的特殊热情¹¹。

同时，我们也很警惕对地方生活以及草药和地方的关系加以过于浪漫化地表达。植物从来就不只是生物意义上的植物，我们对植物总是抱有想象，有时还会不满足于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把理解植物作为目的。草药，同样也是，甚至时常还会在中西医的“传统 - 现代”之辩中，被推到台前，作为一种看似不可驳斥的物质遗产。也正是在这样的自我建构中，我们常会不经意地陷入外部者的“高位者身份”而不自知，在后续的表达中肆意重铸草药和地方的日常。



2024 年，孔长春采摘晾晒的白菊花。图源 / 樺溪·杏坛书院

11. 详见社會學會社公众号发布于2024年10月30日的斯科特 | 薄弱的简单化和实践知识: 米提斯 (上) 一文, https://mp.weixin.qq.com/s/E_2CqIjUmt8txU7jhYj6aw

12. 王海龙.“导读一: 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 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2000. p23.

图片 (右): 樺溪村民野采传统之药食同源——败酱草, 俗称苦麻菜。图源 / 樺溪·杏坛书院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人类学家吉尔兹（Geertz）就提出了“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以特定化、情境化和具体化的描写和观察方式，对抗臆造的浪漫化文化志（romanticized ethnography）。毕竟，“在文化志和人类学的描写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角色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叙述的功能多在展现而不是证明。”¹² 因而，与其浓墨重彩地建构“馨五味”和各味“道地药材”在榉溪的地方草药故事，我们更想将笔墨留给村子生活场景里的日常草药，像立夏时分，家家户户门前竹编簸箕里晾晒的金银花；长春阿叔院子里一地紫白的夏枯草；路侧种来自制土香的木姜子、侧柏、松树等本草原料。“药食同源”在榉溪，并不会如城市生活中那般如此强调健康养生的效用，更多的是地方就地取材的长期经验，拿芝麻杆灰做的灰青糕，中华红褐铃做的碱水粽，豆杆灰做的柴叶豆腐，在一桌子的餐点里，只是用到了地方草药的一道日常菜。

草药地缘中的地方性特质除去“实际知识”和生活场景的“深度描写”外，我们还看到农史学者杜新豪和李昕升将“移动作物”对于动态流通过程的关注，拓展到极易被忽略的、随空间移动和生态环境改变而发生改变的种植技术的研究。与草药采集、种植、炮制和储存相关的地方技术，及其变化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我们会在“地方性”讨论中关注的议题。



在榉溪这个村庄的学习中，我们认为草药的地方性首先是对于“中介”药农的观测，在基于村民日常生活历史的了解上，理解药农如何与草药进行采摘、种植、处理、售卖的互动；再是调查草药之于地方疾病、营养健康观念的关系，这里的“地方”较村庄范围更为宽泛，它是行政区域和地理环境的综合思考；然后是当地人如何通过草药塑造身体认知、情感联系和个体生活场景。

而草药的流动性特征更不可见，我们只能从草药作为植物个体或群体在地理与文化迁徙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去做观测。这些痕迹，有的是建制化学科中追溯许久的研究结论，诸如对特定草药迁徙历史的文献考据、作物野生近缘种的遗传分析；也有那些拭去尘埃后仍金光熠熠的地方往事；抑或仅在故纸堆里有着只言片语的记录、却早已淹没在历史书写里的“无关紧要”。它们对我们而言，不分轻重，实则是各有所长，共同搭起了我们的观测基础。我们会把取自植物地理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民族医药等相关研究中生产的学科知识，作为顺藤摸瓜的起点，而档案旧闻里的星星点点和榉溪村中见闻的“实际知识”，正是那些看似庞杂的藤蔓网络。从地上开始，顺着—根藤蔓往上追寻，我们尝试透过繁茂叶片的遮掩，看到正在长大的果实。



孔金女阿姨野采途中随手摘下的南五味子。图源 / 榉溪·杏坛书院



05/ 补注

之所以有这样的发问，一来是因为在寻找“磐五味”合称的源头时，我们察觉到相关的讯息少之又少，描述大都是“著名的磐五味”、“俗称磐五味”，或是如“享有‘磐五味’之美誉”这类的用词。唯一有提及“磐五味”这三字名称来源的，是浙江日报记者金波的一篇报导——“磐五味”是磐安县政府在 2010 年注册的一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计划作为磐安中药材的中心品牌，用于本地出产的白术、元胡、白芍、贝母、玄参等 5 味药材”。¹

二来，我们在整理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相关文件时，发现早期记载中提到的磐安传统道地栽培药材多为“白术、玄参、白芍、元胡”四味，其中野生白术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宋代以前，元胡稍晚，² 玄参和白芍的驯化时间暂未查得。至于五味中遗落的一味，贝母，我们发现在同一本《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考察报告》中，有一处是将贝母和其它四味一同列入“本区栽培历史悠久，属地方名特产”之列的说法。而另一处则提到贝母是在建国后“逐渐成为磐安的道地药材”，属引种成功的 10 余种新品；此处罗列引种成功的新品时，使用的还是“浙贝”一词。³ 此外，早在明朝就有栽培记载、并作为明清“贡品”的玉竹，也常见于磐安传统道地药材的细数行列，最终却未能入选“磐安中药材的中心品牌”，有时会跟“磐五味”一起被称为磐安六大传统道地药材。⁴

磐五味是哪五味

榉溪村是磐安县盘峰乡下辖的一个千人聚居大村落，“磐五味”的标签也是村子的名片之一。或许是因为盘峰乡恰好地处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南端外围，也可能与村子里日常生活的老年人居多，我们在榉溪村停留的时日里并未听说或见到普遍种植“磐五味”的景象；当然，这一光景还可能跟村子中仍有坚持进山野采的民间医生有关。但想来，他们挖采的草药也并非“磐五味”。

-
1. 金波 . 从“磐五味”到虫草培育，看中药产业进化路 // 浙江日报 . 2022/09/21.
https://mihprc.hmc.edu.cn/art/2022/9/21/art_9749_508.html.
 2. 浙江省磐安县环境保护局 . 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考察报告 . 2001. p11+13.
 3. 分见浙江省磐安县环境保护局于 2001 年提交的《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考察报告》的第 4 页与第 11 页。
 4. 浙江省磐安县环境保护局 . 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考察报告 . 2001. p12.

村子里能用来栽种的土地并不多，甚至路旁有的细长缝隙，也会被村民用作种植圃。大家种的草药不尽相同，当然有的也是飘落此地的种子自发生长的。现在回想，我们印象较深的有射干、四叶对、猕猴桃、白英、夏枯草、金银花等。至于“磐五味”的五种道地药材，除了贝母，其余四味只是零星地散落镶嵌在村中。贝母，是榉溪村村内仅有的、能见到一定种植规模的“磐五味”，由离村子半小时车程仁川镇的贝母种植户应大哥承包种植。

同时，卢震老师也带我们拜访了村子里擅长烘白术的孔花生阿叔。阿叔开着他的电动三轮车，载我们到了离村几公里的山里，看了看他自留地里种的几亩贝母、白术和玄参。阿叔的种苗是从新渥镇买的。前几年收购价不好，阿叔停种了白术，就也没留苗；最近看价格回升，阿叔就把白术种回来了。聊到贝母，阿叔说以前有个老品种，地方上叫“东贝”，他爸爸那会儿种得多。他刚结婚的时候，自己也种过一些。但东贝个头太小，产量低，很不合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阿叔就改种了现在的贝母。

我们在晚些与仁川镇应大哥了解他在承包地种植的贝母品种时也获得了类似的说法，“贝母的种类多，有东贝、红贝，有很多种，我们这个属于浙贝”。仁川镇是磐安县的贝母产业小镇，除了榉溪村，应大哥一家也在仁川当地和周边承包了土地，拢在一起，有个20多亩。每年除了从收获的贝母里挑小个留种，应大哥还会根据当时的种苗价格，到江苏盐城的大丰再买上跟自家留种重量差不多的浙贝种苗。⁵聊到东贝，应大哥也是知晓，但对正值中年的他而言，东贝更多是听说但没种过的品种。东贝个小、产量低的名头，也是家喻户晓，终在大个、高产的“浙贝”引种后，完全步入历史。

回看《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考察报告》里看似前后矛盾的说法，我们心里有了更为清晰的答案——“栽培历史悠久，属地方名特产”的贝母实则是东贝，在建国后“逐渐成为磐安的道地药材”的贝母的确如《报告》所写，是浙贝。⁶《报告》后文在介绍“浙贝母”时，还提到的“九十年代以来，磐安贝母发展较快，现已成为全国浙贝产量最大的产区”⁷，正好回应了花生阿叔的记忆片段。

我们在查阅磐安县新渥镇的讯息时，也发现其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

地方上小有名气的药材市场，摊位上常能见到浙贝母、白术、元胡等本地药材的身影。今天的新渥镇，当年传统市场模样的药材市场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药材城和以其为核心区域规划建设“江南药镇”。我们在今年6月拜访了这个号称浙江省唯一一个以中药材传统产业为依托的特色小镇，或许是没赶上时候，我们在药材城里看到的多是批发新鲜人参和鹿茸的店招，还有品级繁多的铁皮枫斗、三七、西洋参和高丽参等补品，唯在一楼“浙八味特产市场·磐安中国药材城简介”告示牌的对面，看到了一个立有“中药材专区”手写字样的堆台。



仁川镇浙贝母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的一角。

-
5. 应大哥家今年自己留种的比例大约是60%，剩余的40%种苗是从大丰购得。
 6. 本文并不涉及历史本草典籍里的贝母究竟指代哪一地区种植的品种，以及川贝和浙贝具体衍变和区分厘清的历史考证。文中所提“贝母”、“浙贝”和“东贝”皆根据档案资料或访谈人口述整理。
 7. 浙江省磐安县环境保护局，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考察报告，2001. p12-3.

这何尝不是对“磐五味”是哪五味这一发问的一个场景化注解。

一来，我们试图精准溯源的“磐五味”提法，更多时，其或许只是服务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中心品牌”的代表形象，并非要强调“磐五味”具体指代的五味道地药材。就像新渥镇的“浙八味特产市场·磐安中国药材城”，若细究字眼，虽说“浙八味”中的五味的确是“磐五味”，但剩余的三味又是如何作为“特产”被囊括在磐安新城区的这座药材城内？

二来，“磐五味”究竟要包含哪五味？光凭案例考据的纸面信息，有时候也更容易让我们进入顾此失彼的死胡同。白术定然重要，但花生阿叔现在种的白术，早已不是当年文献中记载的——其外形似蛙，断面菊花纹，味清香，俗称蛙术的——道地磐安白术⁸，甚至可能都算不上阿叔刚结婚那会儿跟东贝同期的白术，更不必谈康熙年间方志记载的——其自生者大一二倍，力尤厚，名“狗头术”的——术中精品⁹。“道地”二字，有时除了空间维度的标尺，时间或许也该是我们要留心的另一个参考系。不论“狗头术”、“蛙术”，还是此刻阿叔田里的白术，实则都是“磐五味”五味之一的“白术”。由此再去理解“贝母”，准确来说，是去理解浙贝的后来居上，那么在当下“磐五味”的意涵中，“贝母”和“玉竹”，谁才是“先来后到”？谁又是更“道地”的道地药材？此刻该是有了答案。

《中国中医药报》在2015年的一则报导中甚至还提到磐安评选了新的“磐五味”中药材，分别是天麻、铁皮石斛、三叶青、玉竹、灵芝¹⁰。可见，所有答案的前提，都不能丢了空间和时间这两把标尺。

8. 浙江省磐安县环境保护局. 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考察报告. 2001. p12.

9. 同上. p15.

10. 陶宝东. 浙江磐安评选产生“新磐五味”// 中国中医药报. 2015/09/23. http://www.cntcm.com.cn/2015-09/23/content_7214.htm.

梓溪。古時又稱梓川，桂川。

原屬永興縣孝義鄉四十七都。

1935年10月，劃永興，東山。

縣云，包圍天龍橋村區域成立
大龍山邊靖區。縣設于梓溪村。

1939年1月1日，成立龍安縣。

設在大龍。縣治永興縣城內。

1949年10月30日，龍安解放。

成立人民政府。設在永興。

1950年1月21日，經國務院批

准，龍安全境併回永興縣。

1983年1月3日，國務院下發

批復，同意恢復龍安縣。

06/ 跋

——“在地刊物馆”的美好愿景

在榉溪这座南宋古村落中，筹备一个永久性展呈的在地刊物馆，是心中一直憧憬的美好愿望……特别是2022年9月份在榉溪举办了“在地刊物展·榉溪场”之后，这个愿望就时不时会提醒自己，如何在《一个，人的村庄》榉溪图文展的基础上，让在地的人文乡村精神，能够在榉溪村有更多的可能性……

在临海五月文创的支持之下，在“在地刊物展”策展人季尚之的帮助下，我们和所在地的政府沟通协商了这个愿望的可能性和意义所在，也非常顺畅地开启了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地方政府积极帮助我们申报地方特色场馆建设专项资金，临海五月文创也立马着手帮助我们一起去落实永久性展呈刊物的具体品类。

同时，在和临海五月文创格叔多次交流之后，想着能否借助这一次“榉溪在地刊物馆”的启动，围绕在地人文精神，编一本在地小刊物，献给“榉溪·在地刊物馆”。我和格叔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植南门市部」。因为，榉溪地处以中草药种质资源为保护核心的大盘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又背靠磐安县“磐五味”中药材发展大背景，再加上去年书院接手了榉溪村生物多样性的专项建设，让我们都把目光聚向了——磐五味、榉溪、本草，这几个独具榉溪在地元素标识的关键词上。

在和「植南门市部」团队的沟通中，一开始就有很多共鸣之处。因为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最接地气的生物入境关系探寻，所以很快就达成了共识。这本在地小册子，主要围绕榉溪村乡亲和本草之间的关系，以及磐安县“磐五味”这个重点地方标识，展开独立的调研、采编和思考。

短短半年时间里，「植南门市部」团队一次次来榉溪现场蹲点调研，以积极开放的态度走入榉溪民间中医的精彩拐角之地。终于呈现出，基于不同生长环境、教育体系碰撞交流之后的深度思考。几篇独立文章，均出自于「植南门市部」的团队成员之手，我拜读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如何把他们的触动、敬畏、思考，从文字变成可以体验、传承和思考的“榉溪·在地本草游学”的精彩内容，为当下乡建领域向人文乡村建设转型提供一些尝试性的思考……

在地刊物馆二楼的那些在地刊物，就一颗颗回到日常、回到小地方的种子。就像不久前三联周刊的标题文章——“那些充满褶皱的小地方，正在唤醒我们的附近……”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普世认知，当我们再次回望“榉溪·在地刊物馆”一进门的话：每个地方，都应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在地刊物；故乡不是一个地方，而是这里生活着的人；本地人和他们的生活，才是古镇和古村最珍贵的所在……的时候，心中会有许多根植于心的温暖。

我想这也是，榉溪村获得2024年联合国全球“新可持续城市与人居环境奖”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这座古村落最珍贵的就是它真实无比、活态的聚族而居背后，依稀可以照见的儒家耕读传家精神……

卢震

2024年12月3日晚写于榉溪·杏坛书院

相较于孔加银、孔金女的野采，我们在
榉溪村采访空隙中的标本收集，就显得
格外本分和单调。也正是这份单调和本
分，让我们得以深刻、系统地反思，
从而隐约感受到每一株标本背后，跟泥
土一样原始、不着修饰的本草情绪……

——
编者

侧柏叶有凉血止血、化痰止咳、生发乌发的功效。止血多炒炭用，化痰止咳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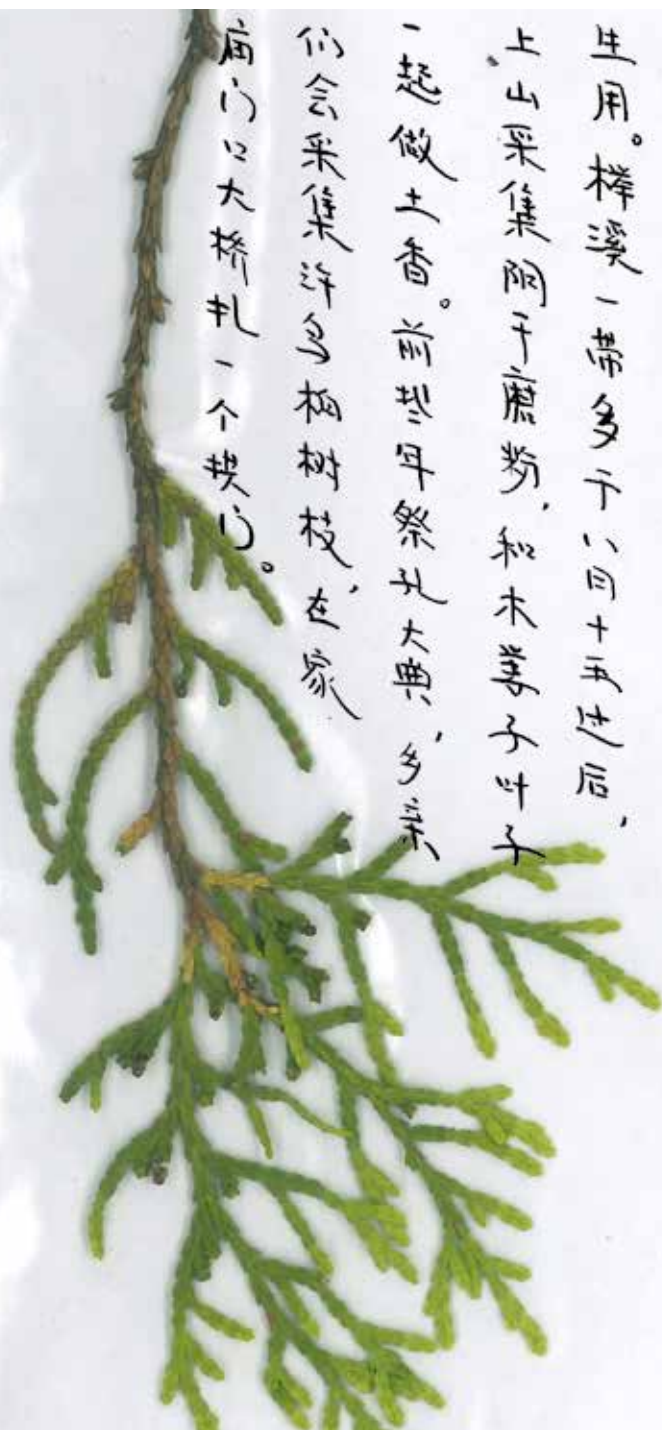
生用。梓溪一带多于八月十五过后，

上山采集阴干磨粉，和木姜子叶子

一起做土香。前些年祭祀大典，乡亲

们会采集许多柏树枝，在家

庙门口大桥扎一个拱门。



侧柏叶

松针切碎后用酒或醋炒熟，外敷
治急性扭挫伤。长皮疮烫后

烂透的松树根，挖出后

磨粉，就是土香制

作最后一道工序，

搓香成型用到

的陶粒粉。这以

年因为松线虫的感

染，村子周围的大

松树基本上都被死了。



松
枝

木姜子在当地没有像在
云贵川那样，成为火燃料
里的灵魂，而是被
乡亲们亲切地

称为“香柴叶”，——就是

长在山上的叶子可

以做土香的一种柴火。

它是做土香最主要的
的粮食剂和香味

来源。八月十五过后采

集阿干、磨粉备用。



木姜子



这是最为生动形象的
命名。因为全株长满了
刺，所以鸟儿根本就
没有落脚的地方。
它是治风湿、关节
疼痛的味良药。
乡亲们上也见到了，
都会挖回家栽块
空地种起来。

这几年养生热兴

来，九蒸九晒的野生黄精

被炒上了天，野生种群遭到

毁灭性的破坏，现多由人工林

下种植为主。

2020年，华南农大的羊

海军博士在自己的老家，就在樟溪

隔壁的大血山村，发现了新

的黄精属新物种并

被命名为“大血黄精”。

凤仙花的

茎称为“凤仙透骨草”，有祛风湿、活血、止痛之效。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屈伸不利。种子称为“急性子”。

有软坚、消积之效。用于治疗噎膈、骨鲠咽喉、腹部
肿块、闭经。同时，茎经腌制后可食其髓部。
是口味独特的一种腌制蔬菜，且耐贮藏。



凤仙花

罗汉松在梅溪是随

着新农村改造，村庄绿

化美化而引种而来的

新物种。村口廊桥外

沿着溪岸南侧，有种了

一排碗口粗的罗

汉松。家庙的西南角有一株。



这株标本来自村里赤脚医生处
大春厨房东侧的压墙上。是阿叔
留种培育的中药之一。它结的果
实成熟后是明艳的橙黄色，
非常漂亮。

常春藤

祛风、通络、利湿。

的功效非常有效，也因此

被乡亲们药农频频使用。以长在三角枫上的最为

上佳。

中华常春藤

樟溪村

周围的林地，特别

是茶园，都有生长了

许多半夏，以前会到季节

了采集晒干卖到樟溪村的收购

站。现在只有村里的良春烟酒店

女主人羊月飞，空的时候会去采一些送给我。



这是采自孔庆家山台所
上的标本。阿叔是个爱种花的
大爷。这是他从其地地方看到
的花非常漂亮，而且花期还
特别长。村里的大多是
从他家引去的。

这是梅溪中医骨伤孔加银
家里种的一棵桂枝树上采
集的标本。在他们家的骨伤
用药中，桂枝用得是根“野外

挖取的时候会遇到

循古中医

的方法，会用入口品

药的方法去甄

别好坏“入口无味的不要，入口苦涩

的不要，入口有异味恶心的不要，有一些辛凉透骨的

藥。

桂枝

这是田野最为常见的

一种中草药。乡亲们

或挖取根茎，或全草

晒干入药。治流感、

发热引起的扁桃腺

炎，及尿路感

染、下焦湿热。



土牛膝

今浙江民间尚用

药——

咯血

咳嗽

野艾

麻5-30克

同鹿衔草5克

同煎。今浙江药

用植物志——胃痛。野艾

麻全草6-15克煎服。



野芝麻

不像云贵川，在梓潼很少有人会挖鱼腥草的根，或者采撷嫩茎食用。但是对鱼腥草清热解毒的功效却烂熟于心。经常会在村里看到非常煮熟的晒场景。

晒场景。

在梓潼有四种常见的紫苏。

两种叶子是紫色的。一

子圆形。一叶子起皱不

平。第三种

叶子绿色

上有绒毛。当

地人称白苏。

还有一种

是野苏。叶绿色。植株矮小些。



紫苏

别名又称“井栏边草”

这标本正是采集于村中宋代

古井“龙女井”的边上。药书记载

能清热利尿、凉

血止血、

消肿解毒。曾于

家后门口见一大

根正在捣凤尾草

用来外敷在踝处一天名肿毒。

杏坛书院后门有一大
片接骨木。有几棵留种的。
都快有2米高。非常茁壮。接
骨木可为服可外洗。对伤筋
动骨都有非常好的疗效。



用根三五枚煎服。

急慢性阑尾炎

当地俗称“苦麻菜”。以前是
没得吃的年代经常上山采摘以
为家用。现在是一道养生健
康土菜。多用来炕饼。
说是吃了不怕蚊子叮。

垂盆草，民间名

用来退湿，效黄痘。

效果显著。有良好

似清热解毒利尿等

功用。别名叫做

狗牙齿。



垂盆草

又名“三叶酸”、“醋母草”。

“田字草”、“斑鸠草”等。

有良好的清热利尿。

凉血散瘀、消

肿解毒功效。

内服治

湿热带

泄泻、痢疾

黄痘。外洗治痔疮。

《诗经·鲁颂·泂水》记载：“思乐泂

水，薄采其芹。”在很久之前水芹

菜就已经是国人采食的水生蔬菜之一。

苏杭一带

的“水八仙”

之一

就有水芹

菜。它还具有

突出功效的一

味中草药，内服治

湿热引起的烦躁、尿血、便血。外敷治带状疱疹。

知下肢的流火丹毒。

水芹菜

桦溪村海拔有500多米。一旦朝遇寒潮霜水。果实就会冻坏。所以有种植枇杷树。但很少能露天成果成熟。枇杷

树一年四季常绿。炼蜜加适量。需的时候要可

临时采摘。开水稀释。加入枇杷叶丝。至黄色。新鲜

叶子。持同向淘后。用文火炒至黄色。取出晾干。生品长于清肺止咳。多用于肺燥

降逆止咳。蜜制后润肺止咳功效增加。多用于肺燥肺阴不足。

用

之前要

把背面的绒毛刷干净。以免引起喉部

不适。枇杷叶有清肺止咳、降逆止咳功效。多用于治疗。

④ 烦热口渴

③ 胃热呕逆

② 气逆喘急

① 肺热咳嗽

乌蕨味微苦，性寒凉。因其
有非常广泛的解毒功效，被
誉为“万能解毒药”。无过

是感冒发热、咳嗽。

还

是咽喉肿

痛、咽炎。甚至

肝炎、湿热带下。以及

痢疾、肿毒、灼伤、烫伤

著有效。

毒虫咬伤、皮肤瘙痒、吐血、尿血、便血。都有显一



梓溪地处山区。野生猕猴桃

资源丰富。八月

十五前后。

乡亲们纷纷

上山采摘

或直接食用。或

用来泡酒。在本地野生

猕猴桃的根是一味常用的

药材。风湿性关节炎、跌打损伤。甚至胃Ca、肝Ca的治疗。



猕猴桃藤

根叶均可入药。根有活血止血、

清热利湿的功效。主治崩漏

痔血、痢疾。

叶有清热、

利咽、解毒、

疮功效。主治

咽喉肿痛、

乳腺炎、湿疹。果实功同覆盆子。



树莓

反是山上最普

遍不过的植物”

常是山区引火柴

的代名词，但却有

非同寻常的药用

功效，热症的金果

肺热咳嗽，尿

道炎，小便

不利，水肿



以及同经皮多，血
山崩等妇科病。

外用可治

创伤出血，跌

打损伤，烂

筋骨，骨折

反

蛇蝎

咬伤。

嫩茎和根

部淀粉还是困

难时期的食物来源。

别名“满天星”、“白马骨”、“辟叶冬青”。传统民间中医

对六月雪的功、效和主治记载丰富多彩。有用

于治疗时行感冒、咳嗽咽痛、

流涕、淋浊、带下、风湿关

节、骨节痛等湿、热、痰病。

对急、慢性肝炎、

肠炎以及小儿疳积等。苗

壮瑶、畲族等民间医家亦多有

记载。堪称一药多治的典范。

梓溪村还有几

位村民在种植很小面

秋似玉竹，每到

秋季采

收之

后，除去茎叶，须

根和泥

土。晾晒至外表有粘

迹渗出。

轻撞去根毛。继续

晾晒到

微黄足，再

进行干燥。

晾晒反复数次

至玉竹柔

小便频数。

润光亮，

清谷易化。

无硬心。

燥除烦。

虚劳发热。

止渴。治热伤阴、咳嗽烦渴。

再晒至

足干收贮。

玉竹

板栗“锥栗”“苦槠”等山野

果实中的淀粉。是

山区人们的

秋日美食。”

更是植

物淀粉

仙重要来源。许多地方美食都是百姓在

艰难的日子里。重新审视土地的馈赠而创造出来的。



又名“拔契”。根部全年可

采。据《陕西中草药》

记载。有除

风湿、

活血、

解毒、

镇惊熄风、抗癌等功效。

叶外用治痛疖疔疮、烫火伤。

《浙江民间草药》：煎汁与猪脚煮食。或配土牛膝。



金剛刺



丁香柿蒂人參姜。

呃逆因寒中氣傷。

溫中降逆又益氣。

虛寒氣逆最相當。

《丁香柿蒂湯》

金櫻子有固精縮尿、固

崩止帶、逆腸止瀉

似功效。多用于

治疝遺精滑精、

遺尿、尿頻、崩漏帶

下、久瀉久痢等。之是泡

制煩瑣。布包揉去外面硬刺，再二控干淨內即種子。



在梓溪村，车前草
蒲公英、鱼腥草都是
乡亲们用得最
为多见
的本草植物。
而且对于
车前草的功效主治
基本上说得相当完备。

车前草

霜降后，经霜打过的树上桑叶，
采摘后洗净晒干，就是
著名中药“霜桑叶”。

盗汗。老人小孩有邪热，
燥热透不出者，清利头目，
有“神仙叶”之称。村中仍有村民
每年按时采制。

光听名字带仙鹤 就知

道必定不凡。民间

常称其为“脱力草”。

有强壮

扶正补虚

之功。

治筋脉力

劳伤、痺痛

脱力草

乏力、面色萎黄、气虚自汗、心悸怔忡等。

乌药是“浙八味”

之外，其他各

道地药

材”

于

台

盘安接壤天台，

乌药资源丰

富。乡亲们有胃寒

泛清水、胃疼症状。

上山挖取乌药，煎服一周就有显效。

现在，

上山砍柴的

没有了。乌药也就

没人砍伐，疯长徒长。

反而根部不会结瘤

瘤。疗

效逊色很多。

刺杉是经济

种植林的主

要品种。生长

迅速，砍后还能

萌发大量树枝。萌芽

更新可连续20年代。还是

梓溪传统建筑工艺中

“望席”编织的原材料。



刺杉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前后。

江浙各地都会采摘“马饭叶”，

制作马糯米饭。来犒劳

辛苦一年

的家中耕牛。

因为这一天除

了是佛生日，也

是牛生日。



熊安玉山古茶场是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是国内唯一

保存至今、民

俗庆流传有序、的

古代植茶制度

的“进化”。熊安茶叶资源丰

一的新鲜茶叶。蒸

富、历史久远。在梅溪新锅开灶。要最后用一满锅

水烧开。以

利。
去大
锅大
示开

梓溪村南史高二山上
 有数千亩高山杜鹃，每
 年四月份杜鹃花
 开的时候，山上就人
 山人海。只为一睹真
 正的“映山红”景象。
 根有和血、止血、消
 肿止痛功效。用于各种
 出血。跌打损伤、风湿关节痛。



杜九

周边山上有不少长了

多年的鸡血藤。乡

亲常结伴砍来切段

晒干备用。鸡血

藤甚而不燥温而

不烈。药性和缓。

是活血宣络

养血荣筋的

上品之药。常配伍

治痹肢体麻木痹痛

独活、威灵仙、桑寄生



“三十六好”就是
说它有三十六种特殊功效。
又名鸭脚板、三叶芹。有消炎、
祛风、活血祛瘀、止咳、解毒、利湿、止
痛、调经、止血、止痒等功效。

《世民造园》

作者 / 江焱、杨杭平、庄明显

顾问 / 卢震、采方山

设计 / 陆子安

出品 / 植南门市部

联合策划 / 临海·五月文创、禅溪·杏坛书院

版次 / 2026年1月1日第二次印刷

